

19世纪『三国演义』

英译文献研究

王燕／著

三国演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世纪『三国演义』
英译文献研究

王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 世纪《三国演义》英译文献研究/王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203 - 2425 - 0

I. ①1… II. ①王… III. ①《三国演义》—英语—
文学翻译—研究—19 世纪 IV. ①I207. 413②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83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3. 25
插 页 2
字 数 448 千字
定 价 13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专项经费的支持。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综合评论文献研究

一 马礼逊对于《三国演义》的首倡之功	25
(一)《华英字典》中的“孔明”词条	27
(二)《圣经》中译与《三国》文体	34
(三)汉语学习与小说英译	41
附：英文原文	44
中文回译	54
二 郭实腊与《三国志评论》	60
(一)语言的天才与多产的汉学家	63
(二)情节取舍与人物重构	67

(三) 译者评价与译介缘由	72
(四) 《三国志评论》的影响与价值	79
附: 英文原文	82
中文回译	105

第二部分 人物译介文献研究

一 美魏茶的三国人物画廊	123
(一) 从米怜到小米怜	128
(二) 从“张氏三兄弟”到“结义三兄弟”	131
(三) “孔明”形象的全面解读	138
附: 英文原文	149
中文回译	168
二 谢卫楼与曹操形象的海外建构	181
(一) 从传教士到教育家	183
(二) 《万国通鉴》中的“中国事略”	187
(三) 比较的眼光与世界的视野	191
(四) 资料来源与人物重构	196
(五) 忠奸立场与正统观念	201
附: 英文原文	207
中文回译	228

第三部分 章节选译文献研究

一 汤姆斯与《著名丞相董卓之死》	245
(一) “印刷工”汉学家	248
(二) 文本解读与文化阐释	252
(三) “历史说”与“才子书”	259
附: 英文原文	265
中文回译	305
二 德庇时与《三国志节译文》	326
(一) 黯淡的政客和耀眼的汉学家	327
(二) 中国小说与戏曲翻译	330
(三) 《汉文诗解》与《三国志节译文》	334
(四) 中文校勘与英文评议	342
(五) 《三国志节译文》的影响与接受	346
附: 英文原文	350
中文回译	353
文献图片	355

第四部分 汉语教材文献研究

一 卫三畏与《三国演义》在美国的译介	391
(一) 《拾级大成》与《三国演义》	392
(二) 《中国总论》与《三国演义》	402

(三)《中国丛报》与《三合会会员的誓言及其来源》	408
(四)《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	414
(五)卫三畏译文的整体特点	420
附：文献图片	422
英文原文	455
中文回译	463
二 艾约瑟与海外佚书《汉语会话》	468
(一)生平著述及汉学成就	470
(二)《汉语会话》的语料来源	474
(三)《借靴》与《琵琶记》	477
(四)“神仙于吉之死”的英译	483
(五)艾药瑟的中国小说观	490
附：文献图片	492
参考文献	518

绪 论

一 研究背景

在中国文学史上，19 世纪既是中西文化碰撞期，也是古典步入现代的文化转型期。学界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时，关注较多的是“西学东渐”，却相对忽略了“中学西传”，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海外传播。当时的译者主要是清代来华传教士与外交官，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及他们之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贡献，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各方忽略的话题。研究“外交史”与“宗教史”的学者，不会深入探究清代来华西士之于“中国文学”的贡献；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很少有人注意清代来华西士这个特殊的群体。另外，他们的著述不仅用英文撰写，而且散布于欧美各大图书馆。资料搜寻的困难和语言的障碍，更使这批英译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举步维艰。

虽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长期阙如，但清代来华西士对于中国小说的译介，起步之早、贡献之大，绝不亚于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兴起之前，清朝来华西士就曾大力提倡过小说。如英国著名汉学目录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1867 年出版的《汉籍解

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曾云:“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并没被中国人纳入国家文献。在这个问题上,某些接受了欧洲思想的人却感到小说和传奇故事(*novels and romances*)这类内容非常重要。尽管文人对小说存有偏见,但小说给予该国各时期风俗习惯以敏锐的洞察,小说提供了一种日新月异的语言的典范,事实上,小说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借以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渠道,此外,小说对(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也定然产生了影响,这些因素都不容人不考虑其重要性。”^①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伟烈亚力在其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开列了137种禁毁小说、14种欧译小说、85种笔记小说和14种通俗小说,这对于研究中国禁毁小说的面貌,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乃至深入探讨清代来华西士的“中国小说观”,都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事实上,像伟烈亚力这样重视中国小说的早期来华西士比比皆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07年,马礼逊来到澳门,为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逐步认识到通俗文学的重要性。1812年,马礼逊就翻译了《红楼梦》第四回,其手稿目前保存在“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档案中。1816年,马礼逊编写的汉语教材——《中文对话与单句》(*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引用《红楼梦》中的语句为语料学习汉语,并建议学生如果读不懂《大学》(*The Da Xue*),可以先读《红楼梦》。1815年,东印度公司出资出版了他编写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其中所列“孔明”(kung-ming)词条就采用了“桃园结义”(The Oath Took in the Peach Garden)等《三国演义》中的情节,还第一次用“历史小说”(a historical novel)来定义《三国演义》的文体属性。1817年,马礼逊撰写的《中国一览》(*A View of China*)再次倡导:

①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China, 1867, p. 161.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没有中国人帮助，要学好中文几乎是不可能的。掌握中文最好的途径是从阅读一本小说（fiction）开始，小说即‘琐言’（Seaou Shwō, Small talk）。它们并非全用白话（colloquial）创作。《好逑传》（Happy Courtship）英文译作 *The Pleasing History*，是白话的。《红楼梦》（*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采用北京方言，也是白话的。”^①正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开启了大规模的西行之旅。

19世纪以马礼逊、伟烈亚力、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等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代表的西方人译介的小说多达40种。其中既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体小说，也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中短篇小说。

这批西译文献弥足珍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有趣的是：第一，当代中西学者在研究古典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作品时，明清时期的文献几乎搜罗殆尽，哪怕一文一诗，均从文人笔记、稗官野史，乃至家谱、方志中钩稽出来，如获至宝，甚至辑成各类资料全编、大辞典等皇皇巨著。但嘉庆以降，出自传教士、外交官之手的相关文献却罕有关注；第二，虽然当代中西学者很少提及这批清代来华西士撰写的英文文献，但马礼逊、郭实腊等人创造和使用的某些文体概念却不胫而走，沿用至今。“历史小说”这一文体概念的使用就颇具代表性。

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小说期刊《新小说》第一次使用“历史小说”这一概念，但在他之前，马礼逊、郭实腊已用 historical novel 来概括《三国演义》的文体属性。在当时，这种用西方文体概念替换中国古典小说传统

^① Rev. R.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17, p. 120.

称谓的做法，实现了中西小说文体类型的初步对接。可是，使用“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毕竟是马礼逊、郭实腊译介《三国演义》时的权宜之计，带有明显的实验性特点，不幸的是这类牵强附会的文体概念不胫而走，从此成为流行术语。时至今日，尚未有人利用早期来华西士的翻译材料深入探究这些常用文体术语的文化生成，更没有人认真省思这种文体之间的强行联袂给中国小说的传播与研究带来的诸多误读、误判。浦安迪教授（Andrew H. Plaks）在《中国叙事学》（*Chinese Narrative*）“导言”中明确指出：“严格地说，中国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Ming Qing Full-length Xiao-shuo）并不是一种与西方的 novel 完全等同的文类，二者既有各自不同的家谱，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①但他担忧的只是严复、林纾把 novel 译成了“小说”，却没有提及马礼逊、郭实腊等人把“演义”转换成了“历史小说”。

近百年来，涉及上述议题的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 1988 年王丽娜女士撰写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涉及语种之众，牯陈资料之多，令人叹服。此后，相关专著、论文不断出现。最近几年，已有学者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这一研究领域，但整体看来依然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学者们或探讨某一传教士的文学贡献，或结合某一翻译理论分析一部译作的翻译策略，尚未能全面系统地整理相关书目、整合相关文献，甚至《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翻译史还在草创阶段。其二，多数研究都是孤立地分析问题，且眼光多局限于著名传教士或经典小说，来华西士译介中国小说的相互影响，以及译文出现的共同特色均被忽略，这不利于全面反思域外中国古典小说译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功能。

围绕这批材料，值得深思的问题很多。比如，马礼逊、郭实腊等来华西士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与研究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他们主要采用了哪些翻译方式？他们的译作在经过必要的文化改写、文化阐释后，

① [美]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 页。

再现了怎样的中国小说？这批 19 世纪的汉学家形成了怎样的“中国小说观”？他们的文学翻译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形象”？在“他者审视”下的传统小说是否因为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而有所改变？他们的译介对于当今的中国小说海外传播又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汉学勃兴的今天，我们对于这些话题的追问显然并非多余。

二 资料搜集

1807 年，随着第一位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来华，中国古典小说开始大规模踏上西行之旅。在“四大名著”中，19 世纪英语世界对于《三国演义》的译介最为重视。它不仅被第一位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看作翻译《圣经》的文体范本，而且被郭实腊、德庇时、卫三畏、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谢卫楼（Davello Zelotos Sheffield, 1841—1913）等著名传教士或外交官多次译介，这些业余汉学家对于《三国演义》的关注与评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近十余年，学界开始关注这批《三国演义》英译资料，只是由于它们或者曾刊载于《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等罕见英文报刊，或者发表在《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汉语会话》（*Chinese Conversation*）等早期汉语教材，这些杂志或教材虽然部分可以借助谷歌图书（Google Books）、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等公共学术网站查阅，但实体书分散收藏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欧美各地，搜集起来有一定难度，相关研究错漏百出、蜗步难移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自 2001 年博士毕业以来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教学与研究。近十余年来有幸得到美国弗里曼基金会（Freeman Foundation）、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等机构的资助，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CUHK）、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日本关西大学（Kansai University）等中外大学访学，陆续搜集到 20 余种 19 世纪《三国演义》英译资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 19 世纪中国小说英译史上，许多问题悬而未决、疑窦丛生，主要受资料所限，以致以讹传讹。

比如，英国汉学家德庇时翻译《三国演义》的情形长期以来颇为扑朔迷离。学界较早关注这一话题的学者是王丽娜女士，1988 年，她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中说：“1834 年由中国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的德庇时（J. F. Davis, 1795—1890）译注的《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还收有《三国演义》中的咏史诗若干首，这些诗的原文是从《皇家亚洲学报》转录的，原书未见。”^①次年，在《英国汉学家德庇时之中国古典文学译著与北图藏本》一文中，王丽娜女士再次指出：“德庇时也往往引《三国演义》《好逑传》《红楼梦》等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诗歌韵语与《老生儿》《汉宫秋》《长生殿》等中国戏曲中的唱词，用以说明中国诗歌与中国小说戏曲的密切关系。”^②这两段文字使学界得出了一个错误判断：《汉文诗解》在论说中国诗歌时引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咏史诗。

实际上，据笔者调查，1870 年出版的《汉文诗解》增订版共引用中国诗歌 100 首，这些诗歌有的是完整地翻译了全诗，有的只是摘译了其中的一两句，其中确有引自小说、戏曲的诗词韵文 16 首：包括《好逑传》11 首、

①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 页。

② 王丽娜：《英国汉学家德庇时之中国古典文学译著与北图藏本》，《文献》1989 年第 1 期，第 273—274 页。

《红楼梦》1首、《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2首、《长生殿》1首、《老生儿》1首。经过仔细查找,在《汉文诗解》的正文部分并没有发现引自《三国演义》的咏史诗。甚至涉及三国故事的诗行,也仅有“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这两句,但这两句出自《三字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丽娜女士的观点不够准确,但在学界影响深远,此后不少学者提及《三国演义》都会想到《汉文诗解》。如国学网(www.guoxue.com)发表的陈友冰教授的文章《英国汉学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探析——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一文云:“德庇士也是英国汉学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他编译过《好逑传》(1829)等明清小说,他翻译的《中国小说选》(1822)是英国最早的中国小说英译本。鉴于汉学家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诗词,他译注的《汉文诗解》专门收有《三国演义》的一些咏史诗。”在此,《三国演义》中的咏史诗甚至成了德庇士特意保留诗词韵文、尊重原著文体风貌的典范。

有趣的是,虽然在《汉文诗解》的正文中找不到《三国演义》的只言片语,但德庇士确实为《三国演义》的英译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翻译的《三国志节译文》(*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也确实刊载在《汉文诗解》中,只是其译文并非咏史诗,也并非出现在《汉文诗解》正文中,而是作为“附录”刊载于1834年澳门出版的《汉文诗解》中。只是这个版本印量有限,极为罕见,故此德庇士对于《三国演义》的译介长期以来信息错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要找到德庇士翻译的《三国志节译文》英文文本,首先需要全面调查《汉文诗解》的前后三个版本。该作最早并非以单行本刊行,而是作为文章发表于1829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二卷(第393—461页)。同年在伦敦出版了单行本,这里不妨称之为“首刊本”。书名同时使用了三种文字:页面顶端由右而左是四个行楷“汉文诗解”,下面是拉丁文书名“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J”，英文名“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紧随其后。

1834 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社（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再次出版了此书，在此不妨称之为“澳门本”，该版本书名未加改动，同样出之以三种文字示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在封面上直接标明文后附有几篇译作和文章（Translations & Detached Pieces）。通过目录可以查知附录的四篇作品分别为：《出使北京》（*Embassy to Peking*）、《三国志节译文》《论中国的自杀》（*Note on Homicides in China*）和一首用拉丁文创作的诗歌（*Cave of Camoens, Macao*）。德庇时在 2 月 20 日写于澳门的简短序言中称这几篇附录的文章“皆与中国相关”。

1870 年，伦敦阿谢尔出版公司（Asher and Co.）再次出版了“增订本”《汉文诗解》，该版本保留了前两个版本的中文名和拉丁文名，英文名改为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与此前两个版本相比，“增订本”《汉文诗解》扩充了引述诗篇，增加了萧纲的《江南弄》、王涯的《送春词》及 30 首《春园采茶词》，部分评价性文字也有所改动。同时，删除了“澳门本”《汉文诗解》正文后的所有附录文章，包括《三国志节译文》。

由此可见，刊载《三国志节译文》的《汉文诗解》仅有 1834 年出版的“澳门本”，1829 年出版的“首刊本”和 1870 年出版的“增订本”均未提及《三国演义》，如果对《汉文诗解》的三个版本调查得不够全面，就很难注意到作为“附录”出现的《三国志节译文》。

此外，德庇时在“澳门本”序言中说：Several applications for the Treatise on Poetry, which could not be supplied in this country, led to the reprint (without publication) of a limited number of copies。由此可知，1829 年伦敦出版的“首刊本”《汉文诗解》在中国难以买到，而 1834 年出版的“澳门本”也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求而重印的限量版，这个版本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没有公开发行。故此，德庇时之于《三国演义》的翻译长期以来少为

人知也就不难理解了。

搜集资料需要四处奔波，有的需要集腋成裘，历经数年之久方有所获，但也确实乐在其中，不乏惊喜。比如，19世纪英国著名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对于《三国演义》的译介，学界长期无人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译文出现在《汉语会话》(*Chinese Conversation*)中，该书在国内未见藏本。2013年笔者在伦敦大学访学时，曾在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SOAS Library)检索到该书。笔者当时虽在调查《三国演义》英译资料，但根据题名，误以为《汉语会话》不过是本普通的汉语教材，故未加翻阅。

2015年笔者在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李勤撰写毕业论文“《借靴》的海外传播”时，发现《借靴》最早以*The Borrowed Boots*之名发表于1852年出版的《汉语会话》。除了《借靴》，《汉语会话》中还有《琵琶记》和《三国演义》的英译文，于是立即请伦敦大学的卢荻教授帮助拍摄了部分图片，一时颇为兴奋，如获至宝，只是当时未能细读全书，故不敢贸然撰文。

2016年，笔者受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资助，赴日本关西大学短期访学，该校图书馆馆长内田庆市教授是研究明清时期欧美汉学家的著名学者。在一次交谈中，他透露自己1998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曾在波士顿校本部最大的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复印了全本《汉语会话》。两天后，内田教授在家中为我找到了18年前复印的《汉语会话》，我连忙请当时在关西大学做博士后的胡珍子老师帮助扫描了全书，由此得以一窥全貌，为相关问题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由于本书涉及的多数资料极为罕见，故笔者将相关英文文献整理后附于正文后。以便海内外《三国演义》爱好者与研究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首先，英文原文全部进行输入、校勘，除了直接更正某些明显的标点错误外，与现代英语拼读方式不同的某些19世纪单词拼读方式，如 behav-